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巴蜀文獻集成》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增補本）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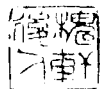
〔清〕劉沅

著

槐軒全書

一

玄孫奇晉恭署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槐轩全书. 1 / (清)刘沅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ISBN 7-80659-858-8

I. 槐… II. 刘… III. 刘沅(1768~1855) - 哲
学思想 - 文集 IV. B24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9313 号

槐轩全书(1)

清·刘沅 著

策划编辑	施 维
责任编辑	胡新农 况正兵 施 维
装帧设计	任兆祥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本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90mm×210mm
印 张	259.25(本册 26.25)
字 数	400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58-8/B·155
定 价	3500.00 元(全套)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學術顧問

蕭蓬父 李學勤

項楚 劉伯穀

主編

段渝 李誠

總策劃

施維

統籌

陳建華 劉建國

槐軒全書志賀

聞三教之精微

丙戌春
蕭蓬父敬題



雙流劉止唐先生於清嘉道間授學川西，一
本儒宗，兼通二氏，影響深遠。惜其遺著湮
沒不彰，鮮為人知。巴蜀文獻集成以其槐
軒全書冠首，對闡揚蜀學傳統殊有貢獻，
值得感謝。

李學勤

二零零六年五月
於北京清華園

槐軒全書誌慶

闡三教之精微闡羣
言之清氣闡治平之
先導亦後嗣之梯航

丙戌夏

槐軒後學周元邵拜題

槐軒全書

發孔孟之微旨，正先儒之謬；

闡佛老之真諦，定百家

之言。丙戌孟夏月

鄉後學王澤材敬題



編纂說明

二零零三年，我們在廣泛徵求意見的基礎上，提出了編纂《巴蜀文物文獻集成》的設想。是年六月，在成都錦江禮堂召開專家論證會。一時群賢畢至，宏論迭出。尤為令人感動者，省老領導楊析綜、章玉鈞蒞臨，對是書編纂發表了學術性的高屋建瓴之論。但是規劃既偉，啓動愈難。文獻編纂體例自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文物部分更涉禁臠，而難以措手……

但是與其口講指劃，坐而論道，孰若振作而起，身體力行！我們於是決定利用現有條件，着手進行巴蜀文獻的整理工作，以期集腋成裘，漸成規模。二零零五年，先將文獻部分獨立申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賡即不循成例，將多方蒐求的《槐軒全書》（增補本）整理出版，並同時啓動《推十書》大字標點本（增補劉咸忻先生未刊手稿本近三百萬字）的整理工作——由此《巴蜀文獻集成》的編纂終於啓開了帷幕。

《槐軒全書》為清劉沅所著，堪稱古代文獻中罕見之會通儒、釋、道哲學，闡發儒、釋、道精微且形成完整學術體系的巨著，乃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化中尚未開發的寶藏。《槐軒全書》由於資料散佚，即使專門的研究者亦難窺其全豹，散佚飄零之簡被當今學者視為「無價孤本」——這一切使劉沅獨特的學術光芒和跨越古今的文化建樹難以為世所知。因此編纂出版完整的《槐軒全書》，無疑具有重要的文化保存價值。

本次出版的《槐軒全書》乃以劉沅之孫、「天才學者」(蕭蕙父先生語)劉咸忻先生親校之西充鮮于氏特園藏本為底本整理修復而成。其中《蒙訓》一書以成都守經堂本代替，又增補了過去未曾收入的《性命微言》、《醫理大概約說》兩種罕見文獻，使本版成為目前《槐軒全書》的最佳印本。

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我們要衷心感謝楊析綜、章玉鈞先生，感謝他們對鄉梓文化建設所傾注的一貫關懷和由此而表現出的高瞻遠矚；感謝蕭蕙父、李學勤、項楚等先生慨然允諾為《巴蜀文獻集成》的編纂出任學術顧問並題辭；感謝劉沅曾孫劉伯穀先生多方覓求，提供了今已罕見的《槐軒全書》全本及《性命微言》、《醫理大概約說》等珍貴文獻並出任學術顧問；感謝萬光治先生在本項目策劃之初的筆路藍縷之功；感謝陳建華先生和施維先生為本書以及將要推出的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所做的總體策劃和統籌運作工作。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

一代大儒劉沅及其《槐軒全書》

段渝

清代學者劉沅的《槐軒全書》，是一部以儒學元典精神為根本，會通儒家哲學、道家哲學和佛家哲學，融道入儒，會通禪佛，而歸本于儒，用以闡釋儒、釋、道三家學說精微，揭示為人真諦的學術巨著。這部著作，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博學多方，不僅所涉領域十分廣博，而且在學術上和方法上自成體系。其內容之宏富，方法之獨特，論述之精深，為當世所罕見，堪稱鴻篇巨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實為中華傳統文化尚待開發的寶藏。

一

劉沅，四川雙流人，字止唐，一字訥如，號清陽居士^{〔1〕}。出生於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咸豐五年（1855年），享年八十八歲。劉沅生而穎悟，沉潛嗜學，隨其父兄讀書，七歲成誦。乾隆五十年（1785年），以冠軍入為雙流縣庠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選拔明經，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由拔貢中試舉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十年（1795年）、嘉慶元年（1796年）會試，『屢薦春闈不售』^{〔2〕}，乃決意留籍奉甘旨，歸家養母。其間邂逅果圓老人，授以心性之學，研習終身，遂會通儒釋道三學，『有如鏡燭犀剖，八面瑩澈』^{〔3〕}。道光六年（1826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4〕}，『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清《國史館劉沅本傳》稱：劉沅『知行合一，以身教人』，『平日裁成後進，循循善誘，著弟子籍者，前

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三百餘人，薰沐善良得為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其受業弟子遍巴蜀，而其學術則駁駁乎有遍及西南各省與大江南北之勢，『學術界人士，不少以得遊其門庭，為高尚其事也』^{〔五〕}，其學術流傳在其身後尤以閩浙為盛，以至『閩人稱沅為川西夫子云』^{〔六〕}。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總督錫良上奏清廷，奏請于清國史館為劉沅立傳。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清廷批复：『着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七〕}

劉沅傳經講學，數十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多有創獲，其說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劉沅的主要著述，由他的後人及門人精選結集，而將其命名為《槐軒全書》^{〔八〕}。

在《槐軒全書》中，劉沅以十三經《恒解》集中闡釋儒釋道三家哲學的基本觀點，闡揚三家的旨意所在；以《正謫》、《子問》、《又問》、《槐軒約言》、《俗言》、《拾餘四種》諸篇，闡釋儒釋道三家學說的精微，將其歸結並上昇到揭示為人真諦以達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

二

劉沅的學術淵源大致有四：一是『仰承庭訓』。其父劉汝欽，精于易學，洞澈性理。劉沅既承父訓，『更求存養之功，内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強，仁者壽，大德必壽，聖人窮理盡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世之談也』^{〔九〕}。他關於融道入儒的思想，關於追求純一即《大學》止至善的思想，主要淵源于此；二是究心儒學元典，『以孔孟為師』^{〔十〕}，終身以闡揚儒學元典精神為己任；三是受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的深刻影響，其主要哲學觀點均與兩宋理學針鋒相對；四是他青年時邂逅野雲老人，老人氏李字果圓，『示以窮理盡性内外本末之功……往來啟導，七載有餘，稍知省躬苦學』，於是苦心研讀數十年，『究心聖道，由實踐而證之詩書』，『而經義則頗為體行，用能略知得失』^{〔十一〕}。這就使劉沅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得以進一步精研覃思，終至成為『名震當世』的一代『大儒』^{〔十二〕}。

劉沅在其近六十年的講學生涯中，究心學術，又常與人問難，多獲啟發，故于儒家元典尤其是孔孟之書頗多心得，于《四書》中『極為發明』，卓有建樹。同時，劉沅在講學解經中發現，自漢以來，不論先儒還是後儒，其對『聖學』即儒學元典的解釋議論多有不合元典精神和孔孟哲學精髓的地方，他認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沒有名師啟導，二是缺乏實踐功夫。所以，劉沅在《槐軒全書》中對於先儒尤其宋儒多有駁難辯論之詞。而他每每駁難宋儒並必與宋儒辯論者，其理論基礎『大率皆以孔孟為宗，折衷先儒』。劉沅認為，先儒尤其宋儒自稱學聖人，却並沒有領會到儒學元典的精神實質，更不用說將其傳承下來。既然如此，『則聖人言行安能一合於身心，措諸修齊平治』^{（一三）}？劉沅之所以必與先儒辯論並將宋儒周程朱張邵一一予以駁難，目的正是在于『恐失聖人之義，則必入于歧途』，把捍衛並闡揚儒學元典置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度。

三

劉沅《槐軒全書》，以十三經《恒解》所佔比重最大。十三經是儒學元典，歷代奉為圭臬。關於十三經的學問，自漢以降稱為經學，其內涵則與時而變。劉沅將其關於經學的學問稱為『聖學』，而決不稱之為經學，意在表明他是回到並站在儒學元典的立場上，用儒學元典精神來闡釋經義，並以此把自己同經學家們區別開來的。劉沅之孫劉咸忻，深得劉沅真傳，被譽為『天才學者』，他在《推十書未刊稿·餘力錄》（巴蜀書社出版）一文中說：『魏鶴山云：君得向來看先儒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正緣不欲于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這番話，更是將儒家元典的重要性講得活靈活現，饒有情趣。

劉沅把自己對於十三經經義的闡釋稱為『恒解』，是頗含心機的。何為恒解？他在《又問》中解釋說：『恒，常也，久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人道之當然，人人可以知，可以能，亘古而不朽者也。』可見劉沅所謂『恒解』，其實就是以儒學元典精神作為闡釋經義的理論基礎，而不容許對元典有所歪曲改竄。至於他為

何著《四書》、《六經》之《恒解》，劉沅在所著諸書的序中均有清楚說明。例如，他在《詩經恒解·序》中說道：『歷代諸儒發明傳統不爲無功，然其不達聖人之意，流爲世俗之譚者抑又夥矣。夫風雅之文通乎天地，而哀樂之過失爲淫哇，不有以正之，則詩之道日薄而詩之義遂亡。愚故不辭冒昧，集上說而折衷焉。凡所疑信，一以聖人爲依，非敢謂毫髮無遺，聊以補前人所未備，名曰恒解，亦以人心之公理，而非有所穿鑿矯勉爲云。』

又如，在《論語恒解》中，劉沅說道：『及孔子歿而禮制益隳……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人之師儒，則能身體而力行者，蓋鮮矣。漢儒始爲訓詁，而義不醇，宋代程朱繼出，乃實表章之……』

由此不難看出，劉沅詳注《四書》、《六經》，爲之作《恒解》，表明他所謂學聖人、明聖經，其實就是『欲存其義』^{〔四〕}，回到儒家元典，弘揚儒學元典精神，『窮極精奧』，駁正先儒，正本清源；同時，他駁斥自唐代韓愈以來的所謂『道統』，揭破宋儒周程朱張邵所謂『理學』，于破中求立，立中求破，從而有破有立，以致『發先儒所未發』，成『一家之私言』^{〔五〕}，終至創立起自己的學術體系。

衆所周知，清代乾嘉盛世，漢學興起，提倡考據之學，反對宋學空疏臆斷，其間名家輩出，在文字、音韻、訓詁、辨僞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就。如閻若璩、胡渭等，力證《僞古文尚書》之僞，力辨《河圖》、《洛書》之晚出，而姚際恒著《古今僞經考》，列舉僞書數十種，皆所謂古代名典。於是乾嘉學派大盛，突破了宋明理學的藩籬，揭發出宋代儒學的空疏學風，極大地動搖了程朱理學的神聖地位。然而，由於乾嘉學派治學以考據爲主，往往流于繁瑣，以致詳于尋章摘句，而略其大要根本。劉沅在《尚書恒解·序》中略述《尚書》真僞及其流傳源流後，寫道：『至今日而排擊罅隙以求必信者，指不勝屈矣。夫讀古人之書，必深悉古人之情事，而又以聖人中正之理衡之，然後不迷于趨向摘句尋章以爲詬病，其亦疏矣。』在乾嘉學派盛極一時的環境中，劉沅獨樹一幟，其治學既吸收了乾嘉學派的若干考證成果，又反對乾嘉學派極于考據的學風，而力倡以『聖人中正之理』即儒學元典精神作爲惟一依據，來揭破宋儒不求甚解的空疏學風，批駁宋儒改竄儒學元典的嚴重錯誤。

劉沅所說的『聖人之學』即儒家元典，是包含了佛家和道家學說的精要在內的。他『以老子每多誤解，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認爲學者只知學習孔孟之道，其實佛家與道家的真知灼見均與孔孟之道相合，而不能超出儒

家元典的範圍^{〔六〕}。這一思想具有特殊的文化意義，它意味着劉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理解，是以儒家元典為主幹，吸納融會佛家和道家學說的精髓與要義，而充分整合起來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體系。劉沅這一獨創的思想，在他的著述中隨處可見。例如，在《子問》卷一中，他說道：『道家言取坎填離，即克己復禮之義耳。』又如，在《又問》中，他說：『復性之功，孔孟而後儒者失其傳矣，而道流存之，所謂取坎填離者即克己復禮，其言先了命而後了性，性命雙修方為大道。』『了命者即孟子所謂立命，了性者子思所謂盡性。盡性立命，聖人所以與天通。』又說：『佛曰明心見性，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老曰存神養性，即存心養性也。』基於這種思想，劉沅並不一律排斥佛家經咒和道家符籙，認為『符法經咒，驅除邪魅亦所常有，但必力行中庸之道，從根本上用功，不可專恃經咒符法耳。孔孟之道人人體行，日用倫常身心性命之理，亦何必用經咒符法。心術品行不端，天地神明降之殃禍，亦豈符咒可了？凡一切法術有益民生者，皆聖賢所遺，但無其本而專事其末則不可耳。』

正是因為以儒家元典精神為本，包容吸納了佛家和道家學說的精髓，究心于三家學說關於天人之際的精微要義，相互發明，透徹精研，身體力行，劉沅才獨創了由『存心養性』達于『至善』、『純一』、『天人合一』的學說。他認為：『天命之謂性。性者，理氣之原而人與天地共者也，以其所自出言之，則曰命。從古聖賢教人盡性必由養心。心者神氣之主，而或僅以空空寂守為治心，則必廢天地民物之常經。氣者，理所載以行，而或以口鼻吐納為養氣，則必為偏枯怪誕之異學。三代以後，儒釋道分門，歷代先賢扶而抑之，可謂詳且切矣。然不究乎理之所主宰與吾身所以相關之故，則人固不知此心何以與天地參，而不言養氣存心之所以然，則人尤不知此身可以與乾坤一氣也。』^{〔七〕}他指出，存心養性，必須以動、靜、內、外相結合，靜固然是動之本，但由於人心浮躁不寧，若不養浩然之氣，則性無所居，心終難靜，『《大學》言止于至善而後定靜安，即此義也。果能定靜安矣，則先天之性可以有諸己，由是而充實光輝以至化神』^{〔八〕}，達到至善、純一而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由此出發，劉沅從根本上批駁並徹底否定宋儒的主靜說。他在《子問》卷一中指出：『周子師海巖，以僧

流空寂之意養後天知覺之心，不知心在後天，非人生而靜之本，安得遂立人極。靜而萬理俱函，動而隨時處中。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佛言真空不空，妙有不有，亦謂不可偏于動靜。後世僧流傳失其真，乃偏于主靜，而無以修齊治平。周程朱張，天資高明，私妄甚少，故一主靜而即生慧，以為盡心知性即此而是，不知其非聖人本末兼盡之學也。』

宋儒的主靜說，是與所謂太極圖有着密切關聯的，而兩宋理學的發生與發展，也都與此密切相關。因此，劉沅對於理學的批駁，也就首先從否定宋儒所謂太極圖着手。

宋儒稱其所傳之太極圖，始源于漢代讖緯『河出圖，洛出書』之說，至宋儒周敦頤著《太極圖說》，始開兩宋理學之先河。至清，乾嘉學者經多方考辨，完全否定了所謂太極圖源于『河出圖，洛出書』的說法，指出河圖洛書實乃後人偽造。劉沅則另辟蹊徑，以證太極圖之謬。

劉沅首先從太極圖源流說起。他指出，周敦頤太極圖原為河上公無極圖，而參以壽涯先天地圖；而河上公的無極圖，陳搏刻之于華山石壁，『尚無大謬』。他接着考析說：『希夷又得先天後天八卦圖于麻衣道人，以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壽涯，壽涯授李挺之，挺之授邵天叟，天叟授子夫。夫希夷知道，故其傳不錯。』劉沅認為，宋初諸儒所授河上公無極圖乃確有其事，而陳搏所授先天後天八卦圖同樣確有其事。但是，傳至壽涯，其授受傳承則出現了大的變化：『壽涯一名海巖，本僧也，而習方士養氣之學，自為先天地圖，又作偈以授周子』。既然先天地圖乃是壽涯所造，本來就毫無淵源可言，而壽涯也並未得到明師啟導，『僅知虛靜養心，不知心性之別。故其圖言養氣之法，全失老子之意』。周敦頤師法于壽涯，雖然察覺壽涯之說不妥，但因其既師從壽涯學習其『虛無之意』，又恐學者以為異學，於是『乃取壽涯之圖，顛倒其序，易名曰太極圖，以為儒理』^{〔二九〕}。可見，周敦頤既失河上公無極圖宗旨，又承壽涯先天地圖之謬，是一錯再錯了。在辨析了周敦頤太極圖之謬後，劉沅做出了『太極本無圖』的結論。他指出：『太極本無圖，所圖陰陽五行成男成女等義，不過一氣變化所形，其實皆在太極之中。』^{〔三〇〕}通過這番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夫，劉沅達到了正本清源的目的。

在對周敦頤《太極圖說》的批駁中，劉沅闡釋了自己對於太極的認識。什么是太極呢？劉沅認為：『天理

止一太極，渾然無象而實天地，萬物所由肇。」太極何在呢？他以爲，太極自有其『至中之所』，那就是聖人所說的至善之境，『一物理氣凝聚于此，無始無終，無聲無臭』，『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原本就不是可以用迹象加以求證的。人類孕育于天地之中，也就是孕育于『太極之理』，即所謂天理。人既生以後，便失却了本來的純一，若不『受中本來之地』，將不能養其浩然之氣。惟有此『至中之所』，爲血氣所不到，私欲不能侵，所以孔子稱之爲至善，而《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復性而存于此『至中之所』，這就是止至善。『至善之所乃天地之門，性命之府，聚三元于此間，所謂凝道』^(二二)。凝即存心養性，也就是養浩然之氣，道即天理，也就是『天人合一之理』^(二二)。由於天、地、人同源于至善之所，而又同聚于至善之所，因此至善便成爲天理、太極與純一的本原與歸宿。由此，劉沅便形成並完善了其闡揚儒學元典精神、構築天人合一學說的理論體系。

基于對《太極圖說》僅知虛靜養心，不知心性之別的批駁，劉沅從他所倡導的『虛無清淨，存心養性』之說出發，對周程朱理學的主靜說即所謂『存知覺之心便爲靜心』的主張展開了批判。他仍然首先從學術源流即師承關係的剖析入手，指出：『朱子宗程子，程子學濂溪，濂溪師壽涯和尚養知覺運動之心，百日便可通靈神之道，遂以爲聖人之學不過如此，其實乃告子不動心之法耳。採心虛靈慧悟，而修齊治平，一毫莫展。』劉沅繼而指出，由壽涯和尚所傳而爲理學所宗的所謂靜心之法，乃是養後天知覺之心，却不知心有先天後天之別，『不知後天之心非復先天之性』，『但空空存心，不知如來明心見性即盡其心者知其性』^(二四)，可見其主張既不懂得明心見性的佛家本原，更不明瞭存心養性、內外本末兼修是爲大道的儒家本原。劉沅因而指出：『宋人理學，周子濂溪師海巖和尚（按即壽涯和尚），得僧流空空養心之法，而不得聖人盡性之學，程朱相沿。本原既誤，故一切皆非。』^(二五)由此他總結道：『濂溪之學本由禪宗，程朱相沿，以養後天之心爲明明德，又不知存心養性，止于至善之地』^(二六)，認爲理學背離了儒學元典精神，其後果是不但不能修齊治平，而且『誤天下蒼生後世于無窮者也』^(二七)。

爲了闡揚儒學元典，揭破理學改竄儒家要義的行爲，劉沅對二程和朱熹予以了駁難批判。他還是首先從學